

晚清民国湖南骈文举隅

谭家健¹

(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, 北京)

【摘要】: 晚清以来, 骈文受冷落的同时, 骈散正统之争逐渐倾向于骈散相用, 骈文的重心也由江浙转到湖湘。民国以后, 随着白话文的出现, 骈文创作活动越来越势微, 到了四十年代, 骈文和古文都淡出文坛。从晚清到民国, 湖南涌现出曾国藩、周寿昌、王闿运、谭嗣同等一批骈文作家, 他们关切时政, 骈散相用, 兼重情理, 作品短小精悍, 弃博丽而尚轻倩。

【关键词】: 晚清 民国 湖南 骈文 骈散相用

【中图分类号】: I207.255 **【文献标识码】:** A **【文章编号】:** 1673-0313(2018)01-0117-06

晚清时期, 列强入侵, 国门大开, 古老中华面临瓜分之势, 清王朝在风雨飘摇中挣扎。思想文化领域, 西学东渐, 一系列新的文化元素对中华传统文化带来冲击。紧跟历史潮流的散文家, 最早是地主阶级改革派, 接着是洋务派——维新派——资产阶级革命派。他们所用文体, 首先是桐城派古文, 及其支派湘乡派——侯官派, 继后是新变的报章体、新民体。这时骈文较清前期中期冷落了, 但还有一定地盘和影响。叶农、叶幼明说: “这时的骈文起了如下变化。一是骈文的重心由江浙转到沅湘, 集中到曾国藩幕下; 一是长篇巨制减少, 而多为短篇; 一是弃博丽而尚轻倩。”^{[1]159} 民国初期白话文开始在报刊上出现, 五四以后蔚然成风, 古文逐渐稀少, 少数作者的骈文创作活动, 延续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。到了四十年代, 古文和骈文都淡出文坛。

晚清的骈文批评较之中期大为逊色, 骈散正统之争逐渐倾向于骈散相用。其中在骈散理论界贡献最大者当首推曾国藩。

曾国藩(1811—1872), 湖南湘潭人, 平定太平天国的首功之臣, 对晚清时期历史进程有重要影响, 在其事功成就之前已有文名, 随着政治地位的提高, 学术地位也日益强化。他包容汉宋, 兼擅骈散, 宗桐城而有所突破。在姚氏义理、考据、辞章之外加上经济, 把阳刚阴柔的美学标准加以细化。他不赞成阮元诸多观点。曾氏依姚氏《古文辞类纂》体例, 编《经史百家杂钞》, 包括先秦、两汉、六朝、唐宋, 明代只取归有光, 清代只取姚鼐, 基本上是桐城派的文统, 所不同的是不排斥六朝。《杂钞》所选内容广泛, 经部包括五经之文, 子部有《孟子》《荀子》《庄子》《韩非子》《淮南子》等, 史部有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《三国志》《唐书》《资治通鉴》, 六朝文中选了许多骈体文。该书既有别于当时众多的古文选本, 同时也是用事实对阮元的“经史子非文”进行反驳。他把散文的外延大大扩张, 包括了骈文在内, 符合中国散文史的实际情况, 是相当通达的散文观。

在《湖南文征序》中, 曾氏深入阐发骈散各有所长, 骈宜于抒情, 散长于说理。“自群经而外, 百家著述, 率有偏胜。以理胜者, 多阐幽造微之语, 而其弊或激宕失中; 以情胜者, 多悱恻感人之言, 其弊常丰缛而寡实。自东汉至隋, 文人秀士, 大抵义不孤行, 辞多俚语, 即议大政, 考大礼, 亦每缀以排比之句, 间以婀娜之声, 历唐代而不改。虽韩李锐志复古, 而不能革举世骈体之风, 此皆习于情韵者类也。宋兴既久, 欧苏曾王之徒, 宗奉韩公, 以为不迂之宗。适合其时, 大儒迭起, 相与上探邹鲁, 研讨微言。群士慕效, 类皆法韩氏之气体, 以阐明性道。自元明至圣朝康熙之间, 风会略同, 非是不足兴于斯文之末, 此皆习于义理者类也。”^[2] 把骈散的历史发展以习于情韵或义理相分, 平等看待, 而且揭示宋以来散文兴盛与儒家理学大师迭起有关。清代文人概述骈散历史者甚多, 曾国藩

¹基金项目: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“中华古今骈文通史”(14azw012)成果之一。

作者简介: 谭家健(1936-), 男, 湖南衡阳人, 研究员, 主要从事中国文学史研究。

此论是比较深刻、全面的一篇。黄保真三位的《中国文学理论史》说：“他这样来论述文章发展的历史，就一举打破了宋代以来古文家所严守的壁垒，不仅在内容上兼重情理，而且在形式上融会骈散了。这一来长期解决不了的骈文与散文之争，明理与抒情之争，都变得没有必要了。”^[3]

曾国藩对历代一些骈文名家有很好的评价，其《鸣原堂论文》说：“陆（宣）公则无一句不对，无一字不谐平仄，无一联不调马蹄（一种押韵方式），而义理之精，足以比隆濂洛；气势之盛，亦堪方驾韩苏。退之本为陆公所取之士，子瞻奏议终身效法陆公。而公之剖析事理，精当不移，则非韩苏所能及。吾辈学之，亦须略用对句，稍调平仄，庶几笔仗整齐，令人刮目耳。”这样细致入微的鉴赏，在历代四六话中罕见。在给儿子曾纪泽《拟陈伯之答丘迟书》的批语中，他强调骈文贵在运气，“六朝偶俪之文中，有能运单行之气，挟傲岸之情者，便于汉京不甚相远。”曾氏认为，韩柳古文代替骈文而兴起，是物极则变的必然规律。韩愈对偶俪文并不是绝对排斥，而是吸收入其古文创作之中。（见《送周苻农南归序》）皆开明圆融之见。

曾国藩的朋友、门人撰文赞同并发挥曾氏。罗研生《文徵例言》说：“文章家每轻视骈体，以谓徒工藻绘，难语于高古精深。然此在文之命意修辞求之，不在体之单行与比偶也。”说文章是否精深高古，不在形式，而在内容。郑献甫《与阳朔容子良书》讲到，“仆谓散文若古诗，难学而不易工；骈文若律诗，易学而最难工。然散文之工不工皆自知，而骈文之工不工多不自知。”以骈文散文比之于古诗律诗，见解非常精到。

曾国藩以后，骈散相用渐渐为越来越多的文人所接受。

周寿昌（1814—1884），字荇农，湖南长沙人，道光进士，历任翰林院编修、内阁学士、礼部侍郎。毕生好学，尤嗜史书。学古文于梅曾亮，亦能骈文，朴茂清切，有《思益堂骈体文钞》。他和曾国藩、李鸿章、郭嵩焘都是好朋友，有论学谈文书信来往。曾作《曾涤生侍讲求阙斋记》，曾国藩三十几岁筑“求阙斋”书室，周文把“求阙”的含义作深入阐发：一曰“砥志”，即磨砺意志；二曰“箴述”，即认真作学问；三曰“翊化”，即赞助教化；四曰“呕生”，即关心民生。是对曾氏的殷切期许，也包含周氏的人生理念。最后一段写到斋舍本身：“则是斋者，固鲁宗道退思之岩，阮长之不欺之室也矣。斋无定构，择里斯处。十尺非隘，寻仞非濶。有图有史，有琴有尊。牖北开以当风，户东向以纳日。禽鸟时至，能为好音。苔藓径生，领其野趣。间于其中，招素心，数晨夕，商榷今古，激昂文酒。斯又事外之旷致，境中之胜概也。时与吟少陵之诗，得千万间广厦；客有入歧伯之室，试五千卷读书。”条理清楚，有分有合，但前面几大段典故太多，不大好懂。最后这一小段境界高雅，清爽明快，而又切题，把全文的意脉引向高潮。

王闳运（1832—1916），字壬秋，号湘绮，湖南湘潭人，19岁秀才，25岁举人，以后多次会试不第，短期入曾国藩湘军幕，因意见不合离去。平生以著述、讲学为主业，以经术、辞章名扬海内，经史子集皆有重要成就，诗名尤高。著作丰富。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），清廷特授翰林院检讨，旋加侍讲，辛亥革命后任清史馆长、参政院参政。得知袁世凯有复辟企图，即辞职还乡，享年85岁。王氏年高望重，门生故旧甚众，性诙谐，有傲气。思想倾向保守，但爱国立场鲜明。其文章“溯庄列，探贾董，其骈俪则捐颜庾，诗歌则抗阮左，记事之体一取裁龙门”（《清史稿》本传）有《湘漪楼骈体文钞》。

晚清学人面对列强入侵，有战和两种主张的争论。王闳运的骈文《御夷论》认为，“和战者，政教之末迹；争议者，谋国之下道。”应以“强国”为要。先要明白何以其攻势之常不敌。曰“夷狄之患起于我弱，我弱之故生于失政。”国家贫弱必然挨打。所以，“内不强不足以谋外，人无衅不可以构隙。（夷狄）其尊中国也如天，其覬觐也如鬼。……其闻圣人首出，诸侯效命，则蒲伏稽首，求通属国；其有自负强大，侵轶边界，则驱之而已奔亡矣。是故中国强夷弱，则秦人置百越之郡；中国强夷狄强，则汉文为渭桥之师；中国弱夷狄弱，则元、成（汉武帝、汉成帝）受匈奴之朝；至于中国弱夷狄强，边患滋多矣。”这是从中国二千年中外关系史中总结出来的结论。他一连写了三篇《御夷论》，讨论对付外敌的策略，可见其对国家命运的关切。此文骈散兼用，不用典故，纯是白描，有古文的晓畅和骈文的整齐，共同构成遒劲有力的气势。

王氏骈文最受推重的是《秋醒词序》，乃其《秋醒词》序言，内容实为“秋夜有感”，抒怀而兼谈理。假寐而醒，家人皆入睡，一片沉寂，唯有清风蚊鸣。作者感到“乃绝声闻”，唯见“北斗摇摇”，“蜃墙如練”，顿时产生大千世界“辽落一身”的孤独感。

联想自然界一刻不停慢慢在变，人生或长或短，或仕或隐等。待到家人醒来，“群籁渐生”，由静而动，恍忽又从仙界回到人世。于是悟出静而思动，动而慕静的玄理。文章融景于情，由情悟道，参用佛玄却未陷入消极出世。这类哲理骈文魏晋盛行，而清代稀见。他把道理讲得清楚明哲，文章写得流畅优美，故很受好评。既有学六朝文痕迹，又具备晚清骈散互用的特色，句尾多用虚词叹词，行文显得摇曳多姿。王文濡评点说：“超于象外，得其环中，会心处正不在远。”^[4]陈耀南说：“理深文妙，华实相扶。”^[5]

《桂颂》。序文说：“湘绮楼东，有古桂一株，枝叶婆娑，秋日花余，折繁枝置水缸中，凡百余日。大树根深，花悉凋歇。宛彼弱条，寄于勺水，无根苍之可托，寡柯条以为辅。微花四秀，风香郁然。”作者联想到有的人“少遇挫折，遂以夭枉。智慧内削，丰采外凋。”然而“嗟此桂枝，依柯分命，独能苍颖不悴，飞馨流艳；鉴寒泉而写影，零暮雨而无悲。非徒表劲于疾风，明贞于晚岁而已。似别有怀抱，自负孤贞，不夺不移，有符大道。”于是大加颂扬，把桂枝比拟于楚囚钟仪和汉代司马迁，并把自己此颂比拟于屈原《桔颂》。提倡不怕艰苦环境，在挫折中挺拔独立的人格理念。序文兼用骈散，颂文纯用四言，前后互补，相得益彰。

王闳运有两封给妻子的书信，风格迥异。

《与孺人笺》，用六朝文体。其中写道：“十年相守，一旦分襟，既殊少小之愁春，复异关山之远役。想卿独处，应不劳思？然孔雀五里一徘徊，文君白头而蹀躞，况于燕楚异地，凉暄殊节者乎；当阶红叶，寸寸劳心；入室燕雏，喃喃疑语。中人偶望，远感仍来。又足以驻景延年，化公为童者也。”纯用偶语，文辞流丽，较六朝倩人代作寄妻书之虚情假意，有天壤之别。

另一封《到广州与妇书》，以质素的语句，缕述岭南土特产和饮食习惯。

菜必生辛，羹必稠甜。若夫槟榔酸涩，蕉子甘蓝。薯重十斤，芥高七尺。君迁小柿，新会大橙。不含霜雪，多复腐皱。腌橄榄以盐豉，取蚁粪为奇南。榕树不可爨，木棉不可絮。……邦人市海鲜，别为厨馆。则有鲨鱼之翅，海蛇之皮，章举、马甲、鱼逐、鱼夷、天蚝、咸蟹、龙虾、雄鸭、腊鹑，腥秽于市井，纷错于楼馆者，不可胜计。又俗好烧炙，物喜生割。操刀持叉，千百其徒。乞人待肉食而餐，宾筵以多杀为豪。婚礼烧猪，辄列数百。

所述广东菜肴和饮食风气，至今仍然如此。当时湖南人不可理解，王氏斥为“奇诡”“可笑”。今天许多湖南人在广东打工，已经完全接受了。文章题材新颖，描述准确细致，用语不拘奇偶，通俗易懂，读来亲切有味。

中年所作《吊朱生文》，是另一种气氛。同治四年(1865)春，王氏从北京返湘，在河北真定旅馆见到朱姓人灵柩，询其二仆得知，原是同乡，并先后中举，同年参加会试，乃作文吊之。其中写道：“我生而返，子死而归，……闻子之来，航海通津，父子离别，以病托人。亦穷于药，亦遍于神。药不医死，神岂遍问？迟速之期，子又奚吝？无恤无亲，于友于宾。无畏不归，余送子櫬。余情好悲，独往无聊，爰与之子，爰暮爰朝。虽未相识，仿佛而要。“竟然陪朱生灵柩同归故里，可见极重乡情。纯用四言，声调低沉，读来不胜凄怆。中国古代科举考试途中，南方举子到北方京城参加会试，有的要经过数月长途跋涉，某些人贫病交加，死于途中。这类故事在小说戏曲中往往出现，恰恰让王闳运在现实中遇到了。他自己那一年是第二次落第，所以既吊唁死者，也倾吐自己的郁闷。此文与明王守仁《瘞旅文》有相似之处。王守仁是远谪之官吊远来之吏，王闳运是落第举人吊落第举人。颇有“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”的共同感受。

王闳运喜欢模拟六朝骈文名篇。其《哀江南赋》仿庾信同名作，描述太平天国之乱，亦步亦趋，连音韵也相同。其政治立场成问题，艺术水准确实很高。张仁青说：“《湘绮楼集》中，隋珠赵璧，璀璨满纸，虽曰模仿之作，创作之意少，舍己从人，处处无一‘我’在，然而其上继骈文之正轨，延续骈文之命脉，遂使骈文一道，不作广陵之绝，则大有功在焉。”^[6]^[43]

谭嗣同(1865—1898)，湖南浏阳人，曾任军机处章京，改良主义激进派，为了促进改革，不惜抛头颅，洒热血。他的文章，自谓先学桐城派，后学魏晋。其实，既非桐城，亦非魏晋，内容是混杂儒佛道墨，古今中外，语言是参差不齐，非骈非散，唯意所之。也有少数传统的骈体文。如《报刘淞英书》：

嗣同少禀性情，长益椎鲁。幸承家训，不即顽废。然而家更多难，弱涕坐零；身役四方，车轮无角。虽受读于瓣薑大围之门，终暴弃于童蒙无知之日。东游江海，中郎之椽竹常携；西及天山，景宗之饿殍不释。飞土逐肉，掉鞅从禽。目营浩罕所屯，志驰伊吾以北。穹天泱泱，矢音《敕勒》之川；斗酒纵横，抵掌《游侠》之传。戊己校尉，椎牛相相迎；河西少年，擎拳识面。于时方为驰骋不羁之文，讲霸王经世之略。墨洒盾鼻，诡辩澜翻；米聚泰山，奇策纷出。狂瞽不思，言之腾笑。以为遂足以究天人之际，据上游之势矣……

讲的是他少年狂傲，游侠四方的豪情壮志。于景祥说：“这是地道的骈体文，不但讲究对偶，而且又使事用典，但与传统骈文相比，其文气更为舒逸，感情真挚、浓烈，同时又文笔简洁，条理明晰，表现出以气命词的特征。”^{[7]1003}这类文章，他只是偶尔为之。

易顺鼎(1856—1920)，湖南汉寿人，15岁秀才，21岁举人，多次会试不第，曾入张之洞幕，后捐资入仕，历任广西、广东等地道员。关心国事，早期的骈文作品有《与刘松生将军书》，刘松生即刘鹤龄，湖南溆浦人，当时以副将驻防贵州。王文向刘将军指出：“方今偏宗狙伺，妖徒蜂起。绿林横行于郡邑，白棒窃伏于里闾。困已难苏，流方未艾。且西郊蝼蚁(指西北暴乱)，虽受王鈇；东海鲸鯢(指日本)，久窥国鼎。海外神州有九，传箭堪虞(指列强挑衅)；军中国士无双，登坛可待。一旦戈横下瀛，矢及中原，蜃嘘腥绿之烟，鸱啸浓青之雨，则大丈夫建功立业，此其时矣。”此文大约作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期，对内外危机四伏有清醒的分析，鼓励刘将军要准备为国效力。气势雄壮，感情充沛，是不可多得之作。

甲午战争中，极力主战。随刘坤一率师出关抗日，作《讨日本檄》，谴责日本侵略：“曩者琉球一役，敢肆鲸吞；继因台岛孤悬，辄谋豕突。夷人宗社，窥我藩篱……幕府(指刘坤一)祇奉庙谟，恭行天讨……白狼丹凤，前车已报过江；青雀黄龙，上将兼闻渡海。”浓墨重彩，扬我军威，表示必胜决心，气壮山河。议和之际，他上《请罢和议褫权奸疏》，坚决反对割让辽东和台湾，指名道姓谴责李鸿章。继后他曾四次入台，支持刘永福武装抗日活动。辛亥革命后闲居北京，思想跟不上新形势，结交袁世凯之子袁克定，竟赞成恢复帝制，被委为政事堂参事、铸币局局长。袁氏败后，易氏漂泊京师，姿娱声色，抑郁而卒。

易顺鼎是清末民初知名学者和诗人，与樊增祥并称“两雄”。淹通经史，有诗词近万首，诗集20卷，学术杂记100余卷，骈文四十余篇，瑕不掩瑜。

借景抒情名作如《湘弦词自序》：

碧湘九曲，空灵之境也；朱弦之叹，疏越之音也。帝子欲降，微闻落叶；灵均不来，谁拾芳草。然而芙蓉水仙之庙，雨唱犹留；薜荔山鬼之词，烟迳靡歇。尝击汰江介，褰华木末。寺楼坐久，湖天碧蓝；岩树断处，神灯青绿。白蘋花老，鲤鱼拜风；黄陵人去，鹧鸪啼月。孤蓬寂寞，听风听水之思，九歌缥缈，迎神送神之曲。又或三闾秋士，远游制冠；九嶷云君，相思命驾。女嬃意苦，谁家砧砧；洞庭天远，昔年张乐。云梦八九，揽之于空洞；烟骚二五，绎之于杳冥。空青摇愁，冷翠戛响。飘飘乎遗世而独立，泠泠然山高而水深。能移我情，其在是已。

仆以恨人，生兹福地。臣里东家，宋玉之所居处；君山北渚，湘灵之所往来。渔卧秦桃，樵炊楚竹。盖将于是乡终老焉。虽其间桂隐不常，萍踪罕定。蚌江留滞，雄溪羁旅。鸟蓬细雨，何处归真；红叶小桥，有人吹笛。江枫之戾，每渍青衫；山木之谣，难忘乎翠被。既乃驾飞龙兮北征，歌闾蛙而西适。黄河远上，津吏敲鼓；紫台径去，蕃儿鸣角。而故乡烟水之气，入人最深；儿时钓游之地，探怀宛在。三十六湾，二十五弦，未尝一日离以襟抱也。

此文是作者《湘弦词》之内容提要，表达对故乡湖南历史文化和山川风物的无限思恋之情，色泽鲜艳，裁对精工，几乎没有散句。张仁青说：“律以时代精神，或不免失之轻艳。若站在文学的艺术美的立场观之，则亦有足多者。”^{[8]24}

晚清湖南其他知名骈文作者还有：

阎镇珩(1846—1910),石门人,17岁中秀才,以后屡试不利,不求仕进,以执教为业,曾任石门天门书院山长、荆门州学教谕,著作甚多,著名的是《六典通考》200卷。有《北堂山房骈文》25篇,序文较多,往往涉及湖湘人物及景观,借以抒情言志,如《新刻屈贾合刻集序》等是。

皮锡瑞(1850—1908)长沙人,经学家。33岁中举,三次会试不利,乃潜心讲学著述。甲午战败后,积极宣扬保种保教,熔合中西,纵论变法图强,遭到王先谦、叶德辉等保守派的攻击。戊戌变法失败,他被清廷革去举人功名,逐回原籍,交地方官严加管制。他的经学代表作有《经学历史》《五经通义》等。有《师伏堂骈文二种》,其中《游空灵峡记》,四言为主,骈散兼用,气韵生动,写景与用典交融,抒情与议论相间,建筑与游人兼顾,婉转流利,意味雋永,别具审美旨趣。^[9]

在辛亥革命成功、中华民国成立之际,有许多文人以诗词、歌赋、散文、骈文等文学形式,热烈歌颂,欢呼胜利,兴奋之情,洋溢报刊。稍后,革命团体南社成员集结其作品为《南社丛刻》共二十二集,起民国元年,迄民国十二年(1912—1923)其中多数是古文,少数为骈文。

比较有代表性的骈文作者是郑泽(1882—1920),湖南长沙人,字叔容,南社社员,民国以后,曾任长沙日报主笔、湖南高等师范教授、中学校长、财政厅秘书等职务,39岁病逝。著作有《郑叔容诗文书集》《梦庵遗稿》等。他有28篇文章收入《南社丛刻》第8卷、12卷、15卷。18篇古文,10篇骈文。其中《湖南光复纪念颂》(《南社丛刻》15集),又收入李定彝编《当代骈文类纂》,民国九年国华书局出版。该文的中心是赞颂辛亥革命和湖南首先响应之动。兹摘录其中心段落如下:

武昌首义,天下响应。湘浦踵兴,中原色骇。爰整劲旅,载扬洪伐。西克荆襄,北控鄂豫。扬旗舰于洞庭,翔筋幕于汉皋。曾未浹月,虜酋扫命,子黎喁喁,重见天日,视夏配天,不失旧物。兵不刃血,农不輟耒,行者歌于涂,居者庆于野。瞰裔抗稜,宅中定命,武略张皇,声威震赫,如积薪之热(加草头)火,沸汤之沃雪也。伊古以来,玉步之改多矣,未有若斯之易者也。抑所以左右而先后之者,湘中实有力焉,逐客无哀郢之思,大国有张楚之号。南风方兢,朔土乖离。盖一旅可以复夏,而三户终必亡秦。天实为之,岂偶然哉。

且夫湘土之奥衍,海内之上区也;湘土之劲厉,军中无所敌也。故天下非弱也,席捲者四百州;神器难妄干也,窃据者三百载。及湘土光复,鄂渚安枕。湘土长区,胡马夺气。借使汉阳不守,虜骑渡江,湘无异军之突起,鄂乃后顾以增忧。八千子弟,将卷旆于江东;百二关河,畴封泥于函谷,天下事未可知也。天造草昧,湘为首庸。度德量能,其谁与让;建威销萌,靡得而称,湘之茂绩,蔚矣盛矣。元年改朔,九秋戒序。宇清宙澄,云开日朗。烽燧既息,鸡犬无警。追思旧烈,式表元功。五色之旗蔽天,百戏之陈沸地。欢呼雷动,威得星驰。庆兹佳节,纪为盛事。既感汉族复兴之烈,复美湘土继起之伟。

十月十日,武昌起义成功,湖南新军于十月二十二日发动起义,占领长沙。十月二十七日,袁世凯命令冯国璋向汉口的革命军反扑。湖南起义军闻讯,立即于十月二十八日派新军独立第一协北上援鄂。同日,著名的湖南籍革命党人黄兴、宋教仁到达武昌,黎元洪委任黄兴为革命军总司令,担当起保卫武汉重任。而此时黄兴的儿子也在湖南援鄂新军之中。在巩固武昌起义成果的战斗中,湖南是起到重要作用的,这是湖南人引以为荣的骄傲。郑泽这篇骈文,写作时间在民国元年。文中说“元年改朔、九秋戒序”“宇清宙澄,云开日朗”“庆兹佳节、纪为盛事”,当即民国政府于民国元年九月确定十月十日为国庆节之后。文章所表现的热烈欢庆之情,正是当时全国人民共同的心情。

除本文外,郑泽的骈体文还有《光复纪念颂》《歌颂辛亥革》《国政府成立纪元纪念辞》作于民国二年元月一日)、《南北统一共和纪念辞》,皆热烈歌颂辛亥革。《洪司长谏》,民国元年七月,湖南军政府司法司长洪春巖因操劳过度而猝死,谕文充分肯定其贡献。《为秋瑾女士改葬麓山公启》,简单概括秋瑾革命事迹,称赞她“就义杭州”“浙潮偕热血俱飞,湘水共愁心齐咽”“愁雨秋霖,严霜夏陨”。还有《润亥先生五十寿颂》,颂扬好友傅熊湘的父亲在教育方面的贡献。《长郡中校校友会杂志序》,该校是郑泽的母校。《祭宋先生文》,代长沙日报同人祭奠刚刚被刺的宋教仁,作于民国二年四月三日。《与柳亚子书》,给南社创办人寄上诗文数首求正。郑氏其他十多篇古文,几乎每篇都与辛亥革命有关。

在《南社丛刻》中，湖南籍的骈文作者还有傅熊湘(1882—1930)，湖南醴陵人，名专，号钝庵或钝根，曾就读岳麓书院，留学日本，参加同盟会，鼓吹推翻帝制，建立共和，与柳亚子等组织南社。1910—1911年主编长沙日报、大汉日报。辛亥革命后，反对袁世凯阴谋恢复帝制，遭通缉。袁死后，历任多家报纸主笔，经常批评北洋军阀和政客。1924年与“湘中五子”组织南社湘集。1929年后，历任湖南省参议员、中山图书馆馆长、沅江县长等职务，1930年病逝。著作有《傅熊湘集》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。《南社丛刻》录其文75篇(比《傅熊湘集》多若干篇)其中骈文5篇。《钝庵诗自序》，说明他的诗是与社会变革密切联系的。《与柳亚子书》(他有与柳亚子书多通，唯此文是骈体)作于遭通缉避难山中时。《一夕词序》，作于1914年8月，与一群文友聚会，嘲风月，弄花草，不谈政治。《红薇感旧记》是一篇很有特色的抒情骈文。傅熊湘别号“红薇生”，遭通缉避难之际，得到歌妓黄玉娇的掩护。当时的政治环境是：“飞章朝播，志士魂飞；警电夕传，壮夫胆碎。望门乃投张俭，临渡谁期子胥。”“则又倾城艳质，施弱腕以扶将；绝世佳人，矢素心而薰沐。砍断枇杷之树，门闭车迷，歌残杨柳之枝。泥沾絮定，春风鬓影，茂陵何处无家；细雨檐花，杜老于焉有咏。”这篇感旧记实为当时所作诗集之序。其中“望门投张俭”是非常贴切的典故。张俭是东汉末年秀才，名士，曾上书朝廷检举大宦官侯览为非作歹，残害百姓。侯览仇之，指使他人诬告张俭结党营私，乃通缉捕捉。张俭四处躲藏，望见人家就去投奔。民众仰慕其品德，不惜代价掩藏，被李笃保护出居塞外。后来侯览等失势，党锢解禁，他回到家乡，被朝廷征聘为卫尉，察觉曹操有不臣之心，乃辞官归隐。张俭的经历与傅熊湘反对袁世凯而被通缉的处境十分相近。

傅氏后来又作《书〈红薇感旧记〉后》，此时玉娇已经嫁人。傅氏好友蒋同超作《红薇感旧记序》，把黄氏的姓名、身份和她与傅熊湘的亲密关系描述更清楚。傅氏之《红薇感旧记》政治价值颇高，可惜《傅熊湘集》只收《书后》而忽略了《红薇感旧记》。傅氏的古文内容丰富，传记二十余篇，多为革命烈士；游记十余篇，多记湘中山水；与柳亚子的书信很多，《傅熊湘集》所收不全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叶农，叶幼明. 中国骈文史论[M]. 澳门：澳门文学艺术学会，2010.
- [2]曾国藩. 曾国藩诗文集[M]. 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5.
- [3]黄保真等. 姚门弟子与曾国藩的古文理论[M]//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(第七编第二章第二节). 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1985.
- [4]王文濡. 清代骈文精华[M]. 上海：上海文明书局，1916.
- [5]陈耀南. 清代骈文通义[M]. 台北：台湾学生书局，1977.
- [6]张仁青. 中国骈文发展史[M]. 杭州：浙江大学出版社，2009.
- [7]于景祥. 中国骈文通史[M]. 长春：吉林人民出版社，2002.
- [8]张仁青. 六十年来之骈文[M]. 台北：台湾文史哲出版社，1977.
- [9]吕双伟. 晚清湖湘骈文的崛起[J]. 求索，2016(2).